

Opinion

# 重切财富蛋糕：为公平更为持久增长

◎王福重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虽然GDP的增幅达到10.4%，属世界较高水平，但却是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同时，通货膨胀压力虽然有所缓和，但CPI依然居高不下，PPI更是创了新高，留下了隐患。

最引人注意的是，外贸出口下降呈加速趋势；由于人民币升值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地区，如广东和浙江的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从目前的趋势看，如果不调整，经济增速的回落恐怕才刚刚开始，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

中国的国内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投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即政府性的投资，民间投资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毋庸讳言，与民间投资相比，大部分政府性投资的收益是比较低的。问题在于，政府性投资具有刚性特征，地方政府常常把投资工程和项目作为政绩的标志。在总需求的增长中，投资需求的作用一直远远高于消费需求，政府性投资也是通胀压力的重要一环。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增长，再靠出口和政府投资，特别是依靠扩大内需的发展路径，显然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拉动因素，这就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来说，保持适度的国内需求，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居民消费需求和正常的企业投资需求，比国外需求更可靠。外部形势急转直下后，那种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增加出口退税，拯救濒危中的出口企业的舆论，实际上仍是抱着外需为主的思路，很容易误导政策方向，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不但不会达到自身的目的，至少近期不会，还可能耽误时机，耽擱扩大内需拉动需求，并给抑制通货膨胀制造更大的压力。

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两位数，是“超常规”的。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公布的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据耶鲁大学陈武志教授估计，中国每年新增财富的78%归于政府，而其中新增财富的大后，会有一个公平切分的信心。现在蛋糕已经够大，是对国人的更长等待作出正确回答的时候了。

要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就要提高居民收入在GDP总量中的分配比例。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降低税负总水平，增加居民所得比

例。中国实行的是国际上不多见的双主体制结构，既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又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并且税率都较高。因此，一些国际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世界第二。当然，由于各国税制内涵和口径的差异，究竟是否世界第二，很难有定论。但是，从国民总所得的分配结构看，中国的税负或财政所得确有大幅降低的必要。二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者和贫困阶层的补贴。以往财政资金过多用于经济建设投资、行政管理费用途，财政本来就有的公平分配的功能被不应有地忽视了。最近东莞市决定对贫困阶层发放补贴，虽然有些许作秀成分，但仍值得特别嘉许。凡是财政收入已过分富裕的地方，都有发放“红包”的必要。

增加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还需要相对公平地分配结构。收入分配越是公平，一个社会的总消费才会越大。现在，一方面，在总的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份额过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也有不合理之处。除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标称居民收入和财富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超过0.4之外，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是，部分垄断行业的收入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尽管反垄断的呼声不断，有关法律也已出台，但是，垄断的趋势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在石油和石化两大巨头的压力之下，全国多数民营加油站已关门。供电局抄表工年收入10万被认定为正常，某保险公司老总年薪高达6000万之巨，还说自己的贡献超过这个数。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与其努力和贡献并无必然关系，不过是政府垄断的必然结果。行政性的垄断企业吸收了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资源和其他资源，民间投资虽然更有效率，但是制度性的歧视，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因此，政府有必要规定垄断行业的工资标准，垄断部门的工资没有理由高于其他行业。同时，给予民间投资公平的待遇，特别是融资上的平等地位。如果有金融支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倒闭。

如果有了上述的调整，就可以保证适度的社会总需求，在外部因素恶化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也许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做大蛋糕的意义，并没有多想怎样更好地切蛋糕，那是基于蛋糕做大后，会有一个公平切分的信心。现在蛋糕已经够大，是对国人的更长等待作出正确回答的时候了。

首先，原油价格回落的乐观预期不应太早。马来西亚、印度、台湾地区和大陆等都已不堪原油价格而提高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越南从周一（21日）起将汽油价格上涨31%，是最新一例。其次，国内通胀压力仍不容小



漫画 刘道伟

## 减税正当时

◎魏也

为什么两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降低税率后，税收仍然高速增长呢？主要原因是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收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上半年税收数据显，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273%，在今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之后，个税依然快速增长，说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依然过低。为了把多一

些的财富留到居民手中，增强民众的消费实力，促进内需的拉动，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出建议“应将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而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会少多少。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个税起征点还有上调空间。”这意味着，个税起征点有可能再次调整。但如此频繁地调整税率，是否会影响到个税的严肃性？笔者认为，与其这样“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万元左右，不仅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使个税起征点保持至少几年的时间不用变动。

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同样过快，应做修正。虽然，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是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企业税收高于欧美许多国家，甚至也高于东南亚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去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

## 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势在必行

◎周子勋

笔者赞同上调个税起征点看法。显而易见，上半年因通胀上涨和经济下滑，在居民、企业、政府等诸多部门中，居民和企业的利益损失很大，只有政府收入增长仍较为可观。事实上，以下几个因素也说明我国上调个税起征点势在必行。

首先，原油价格回落的乐观预期不应太早。马来西亚、印度、台湾地区和大陆等都已不堪原油价格而提高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越南从周一（21日）起将汽油价格上涨31%，是最新一例。其次，国内通胀压力仍不容小

能启动内需助力。其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十几年前很多人的基本工资就是七八百，现在还是这个水平。其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在美国的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四成，而中国只有2%。

更重要的是民心所向。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在线调查(1879人参加)显示，64.0%的被调查者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让中等收入人群应对物价上涨”的需求更为迫切。44.4%的人认为起征点应在5000元，25.8%的人希望以3000元作为起征点，16.8%的人认为4000元比较合理。

策，给企业尤其是生产类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少数国企还能通过银行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但大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与此无缘。降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利于缓和我国企业尤其生产类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要继续实行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就应追求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诚如经济学家所言，严格说来，减税其实没有时机问题，在任何时候减税都是有利于民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 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多多益善

◎张鑫

致力于提高透明度和规范信息披露，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涌现出更多敢于站出来质疑公司的“麻烦制造者”和敢于面对质疑、敢于面对不足的公司，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单靠公司内部管理层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惯例是不能保证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的。美国安然等名噪一时的公司一夜崩溃，我国银广夏、蓝田、东方电子等公司违规造假就是例证。因为：第一，公司财产采取的委托——代理制使代理人行为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可能不一致，而且责任不对等。股东的目标是企业财富最大化，经营者则可能追求报酬，增加闲暇时间，甚至有可能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背离股东的利益。在决策失误时，代理人的损失至多是失去工作机会和人力资本价值，而委托人则可能失去所有交给代理人经营的巨额财产。这种责任不对等很容易诱发经理人拿股东财产去冒险。第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东在选择经理人时，应聘者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从而骗取了股东的信任，而且越是“差”的应聘者越有“积极性”来做假，结果往往将那些“好”的应聘者淘汰出去了。这类问题又称为“逆向选择”。二是经理人在管理中比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即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在缺乏足够监督的情况下，经理人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违规造假，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既然代理人也是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又存在所谓“机会主义倾向”，因而，仅仅依靠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个人操守很难保证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尤其在股权分散、流动性高，所有者对经理人员监督约束很弱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为了推动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必须借助外部力量。除了监管部门、证券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之外，更需要被上市公司称为“麻烦制造者”或被媒体称为“财务杀手”的“揭黑”群体。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自己的博客或在报刊上公开质疑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对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自封为“财务侦探”的夏草，从2001年开始在7年多时间先后撰文质疑了上百家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问题，其中已经有10家退市，40余家不是被立案调查就是沦为ST或空壳重组，或曝出巨额亏损的消息。2001年，一介书生的刘斌，以600字的短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戳穿了蓝田的神话。由此可见这种“揭黑”群体对于推动这个市场的公开、公平与公正的积极意义。

虽然每一个投资者、甚至每一个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都有权利、也有责任监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但由于绝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拥有相应的会计学或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常常无法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发现问题，这就更加需要那些会看报表、能看懂报表而又敢于站出来质疑上市公司的“麻烦制造者”，来监督上市公司真实、全面、及时、充分地信息披露，把公司违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上市公司经营的股东的财产，接受和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是一种义务。面对“麻烦制造者”的每一次质疑，上市公司都应给予认真的关注和如实的答复，不然更会让投资者失望。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天威保变在遭到夏草质疑时，其董事长感谢夏草提出的问题，并代表公司向投资者道歉，表现出公司应有的态度。这既是对公司自身风险的防范，也是对社会公众的负责行为。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 把平准基金当作政策调节过渡手段

◎熊锦秋

依靠平准基金调控股市不如从根本上完善股市制度。要完善股市健康制度并非短期所能急就，建立平准基金完全可以作为股市政策调节的过渡手段。这是因为，其一，公募基金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它的利益或其小群体利益与整个股市的利益并不一致，更遑论社会公众利益，根本就不该承担政策调控职责。其二，实践证明，公募基金抑制市场大幅波动效果有限，有时甚至对暴涨暴跌起推波助澜作用。其三，随着股市规模与日俱增及基金市场开发难度加大，公募基金要按其意志来对股市施加影响已力不从心。其四，平准基金的引入可以回归公募基金的真正市场地位，并为公募基金找到强有力对手，利于基金行业规范运作。

但平准基金绝非“托市基金”。平准基金买入股票是为了纯投资，其投资标的应优化中选股，而不要选将来能够带来超额回报尤其是超额现金红利回报的好公司确实很难，因此应严禁平准基金参与任何画饼充饥式的题材、概念股票炒作，可以规定投资标的仅限于目前市盈率不高于15倍且经营业绩无造假的公司，规定平准基金从市场增持公司股票的最高比例不得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5%，同时严格限制参与任何公司任何形式的再融资。

建立平准基金的主要目标更应定位于抑制股市泡沫膨胀。在目前投资渠道有限的前提下，股市最为缺乏的并非兜底机制而是封顶机制。成思危先生有句话很有道理，“要防止股市暴跌首先应该防止股市暴涨”，在一个单向运行机制的股市中，缺乏做空机制的股市无理性暴涨成为常事，完善做空机制成为必然选择。笔者认为，股市现货市场制度不健全，将使得不管是推出股指期货还是融资融券这些所谓的做空机制，都很难成为股市风险控制器，反而可能成为风险放大器，而通过利用平准基金所持巨额股票的抛压功能，却可以预防股市泡沫过度膨胀。

建立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逐年提取一定比例印花税再加上首期财政拨款，笔者不赞成从银行贷款筹资把资金规模搞得太大，一是为防公共利益承担过多风险；二是如果平准基金大到能够设计并制造股市波段，这样的股市根本不存在必要。至于平准基金的股票来源，由于央企资产为全民所有，笔者曾建议将央企所持上市公司股票划转20%至平准基金的股票账户；另外平准基金平时可能会投资一些非央企类的地绩绩优股，如果市场形成绩优股泡沫这些筹码也可成为抛压工具。

平准基金属于全社会公众利益，它的运作，不应由证券市场中任何一方包括证监会来管理和指挥，牵头管理者应为财政部。任何举措都有利弊，关键看能否兴利除弊。现阶段建立平准基金若能定位于抑制股市泡沫过度膨胀，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完善股市制度建设的一部分。

## Observer | 上证观察家

# 宏观调控需要强化“供给管理”

◎贾康

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趋于过热和降温两个方向上的相关因素，我认为，现在提出“既要‘两防’，又要避免出现较快的经济下滑”的阶段性调控方针，是适当的、符合实际的。到底经济总体是归于“继续偏热”还是转入“较快滑坡”，尚有待观察两三个月。现在调控当局面临的难点在于，如何敏锐、及时和较全面地把握经济多种变量中最具关键意义的组合信息，合理地动态掌控平衡点。依我看，在把握“相机抉择”调控姿态的同时，把视角扩大到当前中国的特定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在宏观调控的学理层面，对“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出自如下几层看法：其一，我国近一段的物价上涨，确实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虽然有学者质疑这种表述），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一季度8%的CPI上涨幅度中，食品价格占6.8%，房价占1%，其余仅占0.2%。除可能存在的

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食品等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占了大比重。如有针对性地致力于较快增加这部分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

其二，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其实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近年我国在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又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如能运用增收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短线”领域，具有在“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和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大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区域差异在这些年又有所扩大，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都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投入天文数字的财力。

我国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努力实现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养老个人账户和在

全国农村也实施“低保”制度、城镇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等等亟待增加供给，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

还有，为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要尚未得到很好满足。再有，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步构建、健全的过程中，还应继续瞻前顾后适当充实战略性的社保基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高峰、填补转轨成本。

如果我们当前在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积极收敛流动性的同时，有所区别地在上

述不同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能通过加强那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并会解除一大批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和改进普遍的社会心态与“预期”。这将会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大特色。

其三，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自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在经济周期中高速增长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那么在相对低迷期时，通过“反周期操作”中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就是在力求尽量贴近“又好又快”状态的长期持续增长，这正是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

四、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

积极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尽全力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能，可考虑择机推进国、地税合并的机构改革等。

在近期的相关讨论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如何防止“滞胀”的问题。我认为，西方那种由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那么在相对低迷期时，通过“反周期操作”中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就是在力求尽量贴近“又好又快”状态的长期持续增长，这正是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

四、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